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美〕顾立雅 著

马 腾 译



SHEN PU-HAI

申不害

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美」顾立雅 著

马腾 译

SHEN PU-HAI

申不害

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美)
顾立雅著；马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8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ISBN 978-7-214-23959-4

I. ①申… II. ①顾… ②马… III. ①申不害(前
385—前337年)—传记 IV. ①B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1392号

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by
Herrlee Glessner Creel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7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8-271号

书 名 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著 者 [美] 顾立雅

译 者 马 腾

责任编辑 卞清波

特约编辑 康海源

装帧设计 陈 婕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页2

字 数 315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959-4

定 价 6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前 言

大概二十年前，我初步意识到，在战国时代思想史上星罗棋布的人名中，“申不害”绝非无足轻重的等闲之辈。于是，我开始爬梳相关资料，进而汇集所有渊源于其思想的文献表述。渐渐地，我深信申不害诚为先秦之巨擘也。

下一步的工作便是整理文献并进行翻译，这更是步履维艰。十二年前，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但因文字过于晦涩，所以我不希望在未彻底思考之前便将之付梓。我用这些资料作为几门课程的基本题材，面向高年级的学生们讲授，历经诸多校订工作，直至觉得译文已尽善尽美。

尽管如此，即便容许不厌其烦地添加注脚，但展现这些文本与翻译似乎仍时机未到，也难以指望读者就能恰当理解这些文本。如果我关于申不害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要真正理解申不害，人们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对自身关于战国思想的整体观念有所矫正，包括道家、法家，甚至早期儒家的历史。于是，为了展现我对申不害佚文的翻译，似乎有必要撰写这么一本关于申不害的书，职是之故，终成此作。

由于很多片段文本具有隐晦性，我不得不在我的译文中添加很多原文未予表达，而我相信为文本所蕴涵的内容。在附录三的译文陈述中，我已经谨慎地将这些添附的内容加上括号以示区别。不过，遍布括号的

文段有碍阅读,在本书主体部分我所引用的佚文则省略括号。

有些佚文段落也包含在诸如《韩非子》与《战国策》的译本中,已经有前人做过翻译。我尝试在注释中标明哪里可以检索到这些译文。有时,这些译文对我颇有帮助,但在很多情况下,我自己的翻译与前人相当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当存在这些分歧时,我偶尔会专门论述,并给出不同的理由。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不会以扩充注释(已经足够繁冗)的方式对这种问题予以辨析。我对申不害思想的理解迥异于一般观点,这种分歧往往就解释了我对其思想的独特阐释,而无须更进一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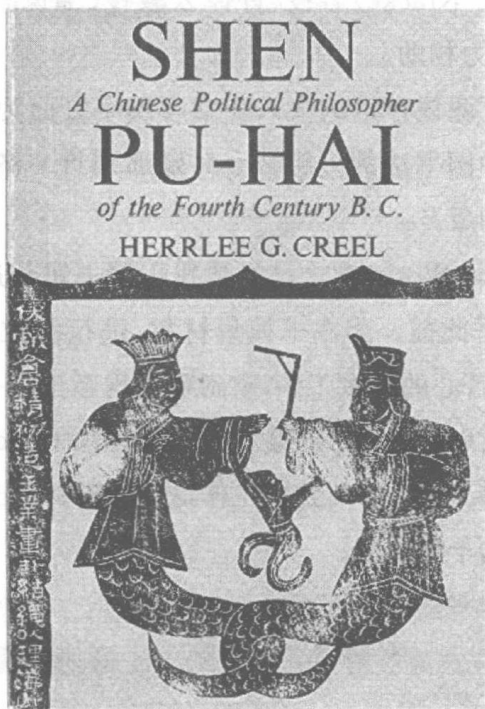
本书自始至终还充斥着大量其他中文文献的译本。每一处,都基于我自己对中文文本的阅读。这些中文文献的译本,市面上已有不少。我在注释中往往参考已出版的译本来引用中文文献。从二手文献援引,纯粹是为读者能够按图索骥。然而,相比书中所引用的已出版译本,读者还是能发现我的翻译往往不乏微妙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实质性不同。

在这番长达二十年的思索研讨历程中,实在难免叨扰诸多同事、学生以及其他朋友,以求取他们的理念、建议与帮助。对此,我无以为报,难表谢忱。

正如其他著作的出版,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顾乐贞博士(Dr. Lorraine Creel)。我们殚精竭虑地谈论层出不穷的难题,她为我的整部书稿贡献了许多的洞识与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建议用“武梁祠”的拓印作为封面设计。

如果没有我的同事钱存训(T. H. Tsien)教授的帮助,这本书将很难完成。尤其是在申不害佚文的搜集工作中,他的帮助不可或缺,若无这番贡献,我的这本钩沉集将残缺不全。还得感谢他借助通讯渠道完成一番穷尽的检索工作,由此可以确证,尽管《申子》一书直到1616年仍流传于世,但如今确已亡佚。这意味着,尽力复原《申子》一书残篇的这项工作极具价值。

还有很大部分的贡献拜前同事穆辛·马赫迪(Muhsin Mahdi)教授



原书封面

所赐。他不仅是伊斯兰哲学[我曾引用他关于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研究]的杰出权威,还是一位资深的政治科学家。每当纠结于申不害难题之际,我便与穆辛讨论,而他也阅读了佚文翻译的初稿。那时,我认为申不害是一位饶有趣味的行政技术家,仅此而已。穆辛则强调申不害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从而启发我更应知人论世,这一提醒真是一针见血。

在与几个班级的高年级同学研读《申子》佚文的过程中,他们关于改善翻译与扩充对申不害哲学理解的宝贵意见也让我获益良多。1968年,我在多伦多大学主办了一场研究这些文献的小型研讨会,很多学生与部分学系成员都参与其中,完成了一番妙趣横生的研讨。至少目前看来,我研究的这一主题仍可谓艰苦卓绝,所有曾对此予以启蔽发聩的帮助,我都感激不尽。

在这番研究的方方面面,我还得到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

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教授、许倬云教授、邹谠教授、陶天翼(Tao Tien-yi)教授的鼎力相助。

我还得隆重拜谢钱存训的夫人在书写汉字方面为本书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欣赏中国书法的人想必会对她那别具一格的雅致书法与曼妙神韵留下深刻印象。

琼·沃克(June Work)女士已经帮我印制书籍超过三十年,但她对这本书的贡献超乎此前。为本书搜集材料,进行细致入微的一校与二校,堪称一番煞费苦心的繁重工作,整副重担均系于琼一身。此外,她不仅制作人名术语索引(Index),还编定原文献索引(Concordance),这些都是更为吃力的工作。对待所有这些工作,她总能体现出一如既往的乐此不疲与令人惊叹的干净利落。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申不害是谁	1
第二章 背景	7
第三章 生平	17
第四章 旨趣	35
第五章 中国行政系统	38
第六章 君主	48
第七章 大臣	66
第八章 名学	88
第九章 技术	104
第十章 申不害与“法家”	114
第十一章 申不害与道家	139
第十二章 汉代以前的影响	165

第十三章 汉代影响	195
第十四章 后世影响	231
附录一 申不害史料考述	245
附录二 《申子》辑佚	279
附录三 申不害佚文	283
参考文献	317
索引	333
译后记 廿载覃思,垂范汉学	347

第一章 申不害是谁

公元前 141 年的一个冬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签署了一份注定对芸芸众生产生深远影响的诏书。一个如此年幼的男孩并不常有这种机会决定人们的命运，但是这个男孩原本就非同寻常。他正是汉武帝，他开启了一段令中华帝国战乱频仍的统治，直至五十五年之后驾崩为止。^①

他所签署的诏书是常谓为“儒家胜利”的第一步。汉武帝统治时期，是一个中国政府与儒学旗帜进行名义上联姻的进程，这段婚姻将随着分合兴衰持续长达两千年。公元前 141 年，当汉武帝掌权伊始，儒家大臣们无疑意识到，必须充分利用他们对这位刚愎自用的男孩的暂时支配优势。他们主张罢免一些治异端学说的贤良，奏请汉武帝准许。在这申被宣布禁止的异端学说名单中，第一个名字便是申不害。

那我们也许会追问，申不害是谁呢？不仅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会有此一问，而且即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可能同样对这位人物闻所未闻。一些中国哲学史家甚至也对其置若罔闻。其实，申不害并非从来就默默无闻，可颇为讽刺的是，公开宣显申不害之名的高光时刻，正是公元前 141 年下诏禁止其学之时。

^① 在本书中，“汉”朝在书写上以第四声的重音标识，以区别申不害所处的“韩”国。

2 作为一位履历辉煌的韩国国相，申不害于公元前 354 年开始掌权。在经过约十五年或更长的持续执政后，他在职位上自然去世，这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可谓非同寻常。申不害不仅是一名从事实务的行政官员，还是一位行政哲学家。这一事实，不仅体现于与其有关的记述与轶事，还可以从以他命名的书中得到印证。尽管这本书是本人亲著，还是由后人集其言论所撰，如今已无法确证。

无论如何，显然这本名为《申子》^②的书于其时非常流行，有很多人自谓继承其学。申子提倡一种高度集权、紧密组织的政府类型，这在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仍未曾被付诸实践。公元前 221 年，秦国扫六合完成一统，并建立了一个在诸多方面符合申不害所倡特质的政府。

秦政府受到普遍的误解。人们常认定秦政府的运转几乎纯粹建立在恐怖统治的基础上，即便对轻罪也施加重刑，以迫使人们遵从统治秩序。诚然，存在这样一种恐怖统治。它基于一套“赏刑”的统治哲学，由申不害同时代的商鞅所发明。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像秦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有效统治可以仅仅立足于“赏刑”，就算只持续十五年。秦政府理念的发明家李斯曾清晰指出，刑事法的运用导源于商鞅，同时秦也借助于申不害（这方面全无“赏刑”话语）关于政府组织与技术的哲学。^③

3 公元前 206 年，汉朝取代秦朝，秦朝依赖的酷刑被全盘清算。但与此同时，这一鼎革又引导汉政府正确地沿袭秦代政府组织与技术，并任用许多曾仕于秦政府的人士。这些现象引致了儒家持续而尖锐的批判。然而，这仍指引着汉政府，在竭力公开斥责“暴秦”并与之划清界限的同时，未曾抛弃秦朝的行政组织与技术。当然，他们也做不到。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秩序上，且易于遽尔倾塌陷入混乱。能使这台巨大机器保持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运转的其他

② 《申子》一书今日不传，不可混淆于慎到所著《慎子》。后者“慎”字以重音标识，以免混淆于申不害。

③ 参见本书第 221—223 页。（译者注：指英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边码，后同。）

行政系统,可谓付之阙如。

于是,汉代早期申不害哲学仍相当流行便不足为奇。其书之抄本显然相当富足,我们也能看到学者们、政客们甚至皇帝们研习其学说。申子位于公元前141年的禁止名单之首,无疑也是这股潮流的势所必然。

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几乎使申不害的名字、思想与存在本身被束之高阁。于是,人们的焦点都集中于所谓儒学经典的研究上,儒学成为通往所有职业中最具殊荣之职官阶层的独木桥。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从养猪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丞相,据说就是因为精通《春秋》。这事发生后,《史记》载:“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④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其中长篇列传用以记载重要程度不及本纪、世家的人物。不过,作者司马迁只在一篇列传中以屈屈六十八字处理申不害。申不害的诸多行政哲学被那种称为“官学儒学”(orthodox Confucianism)的奇妙学说所汲取,这种学说对先秦孔子来说非常陌生,正有如佛教之于乔达摩本人。但是这种汲取并没有予以相应名誉,儒者既无视又否弃申不害。他的学说也许就是在无意之中被误解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到公元一世纪真正理解其学说的人已屈指可数。申不害不再是一个知名人物,也不再如过往那般被铭记。

但申不害之学绝非再也无人问津。的确尚有其人,只是已缩聚为一个直接攸关政府运转的位于统治顶层的小圈子。汉宣帝(前73—前49)就特别好观《申子》中的《君臣》篇,并令一名官员订正文本。著名政治家诸葛亮(181—234)也将《申子》奉为集中研究的书目之一,据说还亲手抄写。通观那几百年可以发现,不时会有一些身居高位者关注申不害的哲学,只是其影响难以评估。《申子》一书有时被列入正史的经籍志或艺文志,有时则被忽略。直到1616年,在一份私人藏书目录中仍可见《申子》一书,但自那以后该书似乎就完全佚失了。

^④《史记·儒林列传》(121.8)、《汉书·董仲舒传》(19B.17a)。《春秋》是鲁国的一本编年史书,涵盖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传统意义上视为孔子所作,但现在并无重要学者接受这一说法。

不管在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学人更是极少提及申不害。冯友兰在其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以不到一段的文字对申不害进行了评论。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思想》中，我自己也只用六行予以处理。

如果申不害的理念及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均稀松平常，这么做就无可非议。但是，他的思想却可谓独树一帜。

中国人的智识和精力主要用在了政治机构发展上。在行政机关方面，中国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他们就运用在现代之前其他地方尚未具备的纷繁技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进行控制，从而巩固一个几千万人口生活的国家。范·德·斯普林克尔(O. B. van der Sprenkel)写道：“几乎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在行政组织问题方面仍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⑤这里可以提出两种技术作为例证，也顺便可直接追溯到申不害的影响：官员考试与官员考绩制度。

中国行政技术的影响远超中国版图，对东亚国家以及很多中亚国家政府系统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较少检验的是对欧洲的影响。这最早仍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随着现代官僚统治国家在西方的发展，这种影响也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已持续到二十世纪。^⑥

当然，若把这种卓著的中国行政系统归为申不害或某位人士的发明，纯属天方夜谭。那是在他的时代以前，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检验试错的结晶。只是看起来申不害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察觉这一发展进程中隐含的原则，并予阐幽抉微。他对后世政府结构及其实践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因而，在中国行政系统的创造方面，申不害的影响就比其他人物高出一筹。

申不害思想的重要性还有另一个理由，不仅对研究中国而言，对于研究一般的政府问题也是如此。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论犹如凤毛麟角。作为关于西方古典政府的重要理论，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

⑤ 斯普林克尔：《马克思·韦伯的中国研究》，第357页。

⑥ 参见顾立雅《中国治道之源》(一)，第1—27页。

(Aristotle)往往恰如其分地被引用,不过他们倾向于假定城邦是唯一合适的政府单元。于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一个恰当规模的国家必须限制其公民数量,使国家足够小,从而人们可以“了解每个人的品格”。^⑦ 城邦的观念继而影响罗马人,甚至持续到他们统治一个庞大帝国之后。奇怪的是,罗马人虽如此渴求开疆拓土,却似乎对行政原则兴趣索然。^⑧

不管如何,在我们的时代,在主要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辟发展出来的研究之前,真正抽象的行政理论难以找寻。而即便在韦伯的分析中,也有某些倾向源于他自身的时代背景,而非纯粹严密检验的结果。^⑨

诚然,我们都不可能生活于真空,各自理念固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或抗争所处的环境。申不害也不例外。然而,他能从塑造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哲学家的思想因素中解放出来,这种程度已经引人注目。他从未求诸宗教力量、历史传统、家庭纽带、忠诚品格。他的政府系统几乎完全基于行政技术及应用心理学。若将其言论与我们同辈的社会科学家相比,就会惊讶地发现,申不害所应对的往往是同样的问题,有时也达致类似结论。

这平添了申不害理论的独特旨趣。时空疏隔如此,申不害却几乎为我们所身处的状况给出某种隔绝的“实验室”结果。虽然他处理的并非组织城邦的任务,而是如何管理广袤土地上众多人口的问题,但就人这一本质要素而言,这些问题是共通的。

留给我们的资料并不可观,且充斥着对申不害的扭曲理解。关于申

⑦ 麦基翁:《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著作》,第1284页。

⑧ 关于罗马政府的研究通常求诸西塞罗(Cicero)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但这两者其实很少论述政府本身或行政原则。西塞罗说:“祖先流传下来给我们的政府,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政府形式。”参见《国家篇 法律篇》,第59页。

⑨ 在一个很长而有趣的脚注(韦伯:《组织理论》,第58—60页注4)中,塔尔科特·帕森斯谈及这么一种趋势与结论:“或许韦伯疏于分析专业权威与这么一种趋势紧密联系,即总体上过分强调权威的强制方面以及人类关系中的层级,尽管在某些特定情形中这些方面确实重要。”德怀特·沃尔多(《研究行政学的各种观点》,第67页)说:“尽管学识渊博且追求客观,韦伯仍不可避免囿于其自身文化环境的视野,可谓一种霍亨索伦普鲁士视野。”

不害的评价,包括其同时代的那些评语,有时带有偏见痕迹。其人生平资料极为匮乏,其书则似乎不可逆转地亡佚,所以为了理解其思想,我们必须立足于其言论的引用,以及在其他著作中保存的原书引述。后者已被视为伪作,然而,通过谨慎考证可以发现,有理由相信其中很多不伪,当然并非全部。这些申不害的口述或文字非常艰深,蕴涵于其中的理念相当晦涩。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混合于一个事实,即申不害选择以最隐晦的语言(这对挣扎的译者来说似乎是种虐待之乐)进行自我表达。也罢,这一思想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发现申不害。